

柳宗元 清风峻节 踔厉风发

刘立祥

柳宗元(773—819年),字子厚,河东郡(今山西运城)人,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、散文家和思想家,世称“柳河东”“河东先生”,因其卒于柳州刺史任上,且主政柳州时政声卓著,又有“柳柳州”之誉。柳宗元文名炽盛,与韩愈并称为“韩柳”,与刘禹锡并称为“刘柳”,与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并称为“王孟韦柳”,是唐宋八大家之一。韩愈撰写的《柳子厚墓志铭》称赞他“踔厉风发,率常屈其座人,名声大振”,由此衍生出成语“踔厉风发”。

高洁淳厚风 化育风华奇少年

柳宗元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柳氏,六世祖柳旦,为北周中书侍郎,封济阴公;堂高伯祖柳爽为唐高宗朝宰相,为官忠正刚直,因得罪武则天被处死;曾祖父柳从裕、祖父柳察躬曾任县令;父亲柳镇曾任唐德宗朝殿中侍御史等职。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名门望族范阳卢氏,七岁通《毛诗》,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才。

唐代宗大历八年(773),柳宗元出生于京都长安,他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志向远大。柳宗元的幼年在京长安度过,在母亲卢氏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下,他发奋苦读,像一株根植于沃土、沐浴着充足阳光雨露的小树一般茁壮成长。

其时,朝廷腐败,天下动荡,社会危机日益加深,守正不阿的父亲宦海沉浮,辗转于各州郡任职。柳宗元12岁开始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生活,居无定所,先后移居宣城、夏口、洪州、夔州等多地,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。这种漂泊迁徙的经历,既平添了几许生活的艰辛与劳碌,也让他见识了世间百态,为少年柳宗元打开了更多观察社会的窗口,使他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与诉求,有了更为广泛、深切的认识和体悟。

高洁淳厚的家风,父亲的儒雅博学与刚正不阿,母亲的温良贤淑、咏絮之才与虔敬崇佛,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柳宗元,为他后来“统合儒释”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贞元四年(788)前后,父亲柳镇奉调回京任殿中侍御史,柳宗元随父回到长安。

此时的柳宗元已成长为一位卓异拔群的翩翩少年,其文章冠绝当时,备受时人推崇。他曾向时任太常博士的文学家权德舆献诗,深受权德舆的青睐;也曾与当时著名的诗人李益唱和,受到李益的啧啧称赞。《旧唐书·柳宗元列传》称:“宗元少聪警绝众,尤精西学诗骚。下笔构思,与古为侔。精裁密致,璨若珠贝。当时流辈咸推之。”刘禹锡的《河东先生集序》称:“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。”

贞元进士及第 革新失败遭贬逐

贞元九年,20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,同榜登科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等人。正当柳宗元摩拳擦掌,欲大显身手之时,其父柳镇竟猝然离世,柳宗元只能依制居家守丧。

贞元十二年,柳宗元丁忧期满,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,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。贞元十七年,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。贞元十九年,柳宗元奉诏回到京都长安,任监察御史里行。

贞元二十一年正月,唐德宗李适驾崩,做了25年皇太子的李诵继位,是为唐顺宗。

顺宗身体羸弱,常年卧病在床,但孱弱的身躯中,却怀揣着革新图强的雄心,立志革新求治,振兴朝纲。他继位后,立即起用王叔文等人推行改革,授王叔文翰林学士,兼判度支、盐铁副使,后转尚书户部侍郎,时称“内相”,代行宰相职权处理政务,发号施令,史称“永贞革新”。

永贞革新亦被称为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,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废除宦官专权,遏制藩镇割据,加强中央集权。王叔文提拔任用了众多政见相同的人,形成了推行革新的政治集团。柳宗元与王叔文政治主张趋同,王叔文亦十分赏识柳宗元的才华,因此,柳宗元成为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,是推动革新的核心活跃人物。

然而好景不长,同年八月,宦官俱文珍等发动宫廷政变,幽禁了在位仅186天的唐顺宗李诵。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,史称“永贞内禅”,持续仅一百余天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。

永贞革新失败后,“二王”之中,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参军,次年赐死;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,不久病逝。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泰等八人皆被贬为边远州郡司马,史称“八司马”。

谪居永州十年 踔厉风发著华章

永贞革新失败后,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刺史,在赴任途中,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。永州位于今湖南省南部,南岭山脉北麓,潇、湘二水交汇处,三面环山,山冈与盆地相间,境内森林茂密,河川溪涧纵横。其时的永州,瘴疠盛行,蚊蝇滋蔓,虫媒猖獗,荒草寒烟,是极为偏僻荒凉之地。柳宗元在《笼鹰词》中曾形象描述道:“草中狸鼠足为患,一夕十顾惊且伤。”

柳宗元携母亲抵达永州后,竟无栖身之所,只得借住在一座破庙里。在凄风苦雨中

艰难度日不到半年,年老体弱的母亲便撒手人寰。

关于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经历,《新唐书·柳宗元列传》作了这样的记述:“俄而叔文败,贬邵州刺史,不半道,贬永州司马。既窜斥,地又荒凉,因自放山水间,其理厄感郁,一寓诸文,仿《离骚》数十篇,读者悲感侧。”永贞革新失败后,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,尚未行至任所,又被贬至更为遥远偏僻的永州任司马。柳宗元既遭贬逐,又身处荒蛮瘴疠之地,于是寄情于山水之间,将身陷困境、壮志难酬的抑郁与悲愤,尽数寄托于诗文中,仿《离骚》作赋数十篇,读的人人皆为之哀婉凄恻。

柳宗元在永州一待就是十年。这十年,是他一生中最为困厄窘迫、艰难孤寂、愤懑难平的十年,也是他涅槃重生的十年,更是成就其散文史上赫赫声名的十年。彼时柳宗元32岁,正值年富力强、意气风发的壮年,且早已名动京华、誉满天下,又曾跻身朝廷最高统治核心,眼前景似似锦,却陡然从万众瞩目的政治新星,跌落到荒蛮幽僻的远州任闲散司马——这一职位徒有虚名,既无实际职权,亦无固定官舍,柳宗元实际处于被管制、软禁的状态,其内心的凄苦、愤懑与无奈,难以言表。

正所谓“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”,命运的陡转,险恶环境的重压,并未将柳宗元击垮。正是这段漫长困苦的谪居生涯,这份从顶峰跌落谷底、跌宕政治际遇,点燃了他炽烈的创作激情,赋予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与灵感。

谪居永州的十年,柳宗元埋首苦读,广涉经史,笔耕不辍,其撰写的寓言、传记、山水游记及记叙文,皆具有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,笔锋犀利,言简意赅,寓意深远,读之令人弦外有余,感慨不已。创作于永州的《永州八记》《捕蛇者说》《临江之麋》《黔之驴》《永某氏之鼠》《段太尉逸事状》等数十篇佳作,代表着柳宗元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,奠定了他唐代古文运动旗手的地位。

柳宗元写于永州的《江雪》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可以看作是他当时际遇与心境的真实写照。全诗仅二十字,勾勒出一幅意境悠远的寒江独钓图,刻入世代读者心中,句格天成,字字精妙,自问世以来,妇孺皆知,百代传诵,堪称千古绝唱。

病逝柳州任上 百姓立祠祭英灵

元和十年(815)初,唐宪宗李纯欲延揽天下人才,振兴朝纲,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贯之推荐了柳宗元、刘禹锡等在永贞革新中遭贬谪的数位贤才。于是,谪居永州十年的柳宗元被召回长安。柳宗元踌躇满志,以为前路柳暗花明,大可放开手脚,一展平生所学,再续永贞革新的理

想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由于宰相武元衡等人的反对与阻挠,起用柳宗元的奏议最终搁浅,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。匆匆抵达长安的柳宗元,只得再次踏上贬谪之路,于当年六月下旬抵达柳州。

出任柳州刺史后,柳宗元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柳宗元到任柳州时,恰逢当地大旱,数月无雨。按照当时的礼制,地方长官需率僚属与百姓祈神求雨。于是,柳宗元率众前往雷塘,举行祭神求雨的仪式,并宣读了《雷塘祷雨文》。在这篇祷文里,他昭告世人,身为刺史,必“廉洁自持,忠信是仗”——这是柳宗元赴任柳州刺史后,首次当众宣告自己的执政理念。

柳宗元每日深入民众,体察当地风土人情,因地制宜,移风易俗,陆续制定诸多教谕,颁布多项禁令,为百姓办实事、谋福祉,逐渐赢得了柳州百姓的信赖与拥戴。他组织百姓开垦荒地,扩大耕种面积,植树造林,整治街巷、筑路修桥,推动生产发展,促进经济繁荣;他兴办学堂,大力发展教育,千方百计普及文化知识,提升百姓的思想文化素养;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陋习,他积极普及科学知识,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,推广医药之术,培养本地医工,提高百姓的健康水平;他劝导百姓破除“穿凿地层冒犯神灵”的陈腐观念,组织带领百姓开凿出柳州历史上第一眼水井,让百姓告别了世代饮用雨水、河水的历史,喝上了清冽甘甜的地下水。

柳宗元在柳州推行的举措中,最受百姓称颂的是释放奴婢。韩愈在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记载:“其俗以男女质钱,约不时赎,子本相称,则没为奴婢。子厚与设方计,悉令赎归。”柳州当地曾长期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,百姓借钱时,需以子女作为人质抵押,若未能按期赎回,待利息与本金相等时,子女便会沦为债主的奴婢。柳宗元到任后,当即发布政令“革其乡法”,规定凡为债主服役的抵押者,可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,待工钱累积充足以抵偿债务时,即可赎回人身自由,与亲人团聚;对于已然沦为奴婢的人,柳宗元自掏腰包为其赎身,送还其父母身边。新规一出,柳州百姓无不欢呼雀跃。

柳宗元的这一善举,深得桂管观察使裴行立的赞赏,裴行立将此做法推广至桂管所属全部州县,不到一年,挣脱奴婢枷锁,重获人身自由者多达千人。

柳宗元的卓越政绩与斐然文名,让他拥有了众多倾慕者与追随者,当地青年学子纷纷登门求教,其府第终日门庭若市。无论政务多么繁忙,柳宗元对前来求教的学生皆悉心教诲,循循善诱。据《旧唐书·柳宗元列传》记载:“江岭间为进士者,不远千里随宗元师法;凡经其门,必为名士。著述之盛,名动于时,时号‘柳州’云。有文集四十卷。”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余篇文学作品,涵盖论说、寓言、传记、游记、诗词赋等诸文体,有《河东先生集》传世。

元和十四年,唐宪宗李纯推行天下大赦,宰相裴度上奏请求召回柳宗元,宪宗准奏。然而,召回的敕书尚未送达柳州,十一月初八,柳宗元便在柳州溘然长逝,享年47岁。

柳宗元身后家贫如洗,竟无钱办理丧事,其好友裴行立慷慨解囊,出资相助,他的灵柩才得以归葬河东故里。柳州百姓为纪念这位心系百姓、政绩卓著的刺史,在柳州罗池湖西畔修建了罗池庙,后更名为柳侯祠,前来祭奠凭吊的百姓,世世代代络绎不绝。

柳宗元少年“聪警绝众”,20岁进士及第,名动京华,32岁跻身朝廷最高权力核心,矢志革新,朝廷本欲对其“欲大进用”,他俨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。永贞革新失败后,他接连被贬永州、柳州,历经坎坷。谪居永州十年,他矢志不渝,踔厉风发,埋首苦读,勤奋创作,实现人生的涅槃重生,奠定了唐代古文运动旗手的历史地位。主政柳州期间,他秉持着峻节,忧国恤民,兴利除弊,移风易俗,大力发展地方经济,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祉,直至病逝任上,深受百姓的爱戴与景仰。

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道:“诚,信也。”孔子也说:“人无信不立。”历史上,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注重诚信建设和个人诚信表率,并将之奉为治国之道。唐太宗就是这样一位“大信行于天下,不欲以诈道训俗”的政治家,他的主张如《贞观政要·诚信》中所言:“上不信则无以使下,下不信则无以事上,信之为道大矣。”

“信,国之宝也,民之所庇也。”这指出了诚信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宝和重要方略。唐太宗将取信于民作为立身之本、为政之道,成事之要,时常以“政令不信者弱”“一言为重百金轻”警醒自己,完善治理举措,开启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华章。

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八》记载了这样一则事:唐太宗派人征兵,宰相封德彝上奏说:“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者,也应征集当兵。”唐太宗表示同意。然而魏徵却不肯签署敕令,如此往返四次。唐太宗大怒,把魏徵召进宫中责备说:“这些不满十八岁魁梧壮实的,都是那些虚报年龄以逃避兵役的人,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,你却如此固执地反对!”魏徵回答说:“用兵在于遵循规律,而不在于人数众多……陛下常说:‘吾以诚信御天下,欲使臣民皆无欺诈。’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,就已经多次失信了……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员,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处理,至于征兵,您却怀疑他们有诈,这还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?”李世民听后深以为然,立即收回成命。

荀子有言:“夫诚者,君子之所守也,而政事之本也。”唐太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君臣之间关乎诚信与执政的问题:“言而不行,言无信也;令而不从,令无诚也。不信之言,无诚之令,为上则败德,为下则危身,虽在颠沛之中,君子之所不为也。”他深知“言而不信,则民不附”的道理,认真听取谏言,不断修正施政中的偏颇之举,使“德礼诚信”作为治国之纲要。

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八》记载:“上思更多受昧,密使左右试略之。”武德九年(626),唐太宗担忧官员贪腐盛行,秘密安排身边的

人向官吏行贿,以检验其是否廉洁。果然,有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,唐太宗要将其处死以警戒其他官员。这时,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:“为吏受赂,罪诚当死;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,乃陷人于法也,恐非所谓‘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。’”意思是说,作为官员贪污受贿,罪责诚然当死,但是皇上故意派人向官员“行贿”使其犯错,实际上是不讲诚信,有意设下“陷阱”让人触犯法律,这恐怕与“用道德引导百姓,用礼制教化百姓”的古训相违背。唐太宗听后自感不妥,于是欣然将这件事通报给朝廷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,说:“裴矩当官力争,不看我脸色行事,倘若大家都能这样,何愁国家不治。”

唐太宗是个善于以史为鉴、以诚治国的皇帝,他曾对近臣和宰相们说:“周得天下,增修仁义,秦得天下,益尚诈力。”他指出,重诚信、讲“仁义”让周朝享国近800年,而秦国不修仁政,轻弃诚信,崇尚“诈力”,仅统治了15年便灭亡。唐太宗在以诚施政、取信于民的治国实践中,做到君臣无欺、注重表率,并将诚信作为修身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根本之策。

贞观初年,有官员向唐太宗上书建议“请去佞臣”。唐太宗问:“我任用的人,都认为他们是贤臣,你知道谁是佞臣吗?”官员回答说:“我身在民间,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。请陛下假装发怒,来试一身边的大臣们,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,直言进谏,那就是正直的人。如果谁一味顺从陛下,那就是佞邪的人。”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:“流水是否清浊,关键在于源头。君主是施政的源头,臣民就好比流水,君主自己欺诈不诚信,却要臣下行为正直,

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,这是根本办不到的。我常常认为曹操言行多诡诈,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,现在如果我也这么做,不是效仿他吗?这不是教化天下的办法。”唐太宗又对上书的官员说:“我要以至诚治天下,不想用欺诈的行为破坏社会风气,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。”

唐太宗不仅注重个人的诚信修养,还注重将诚信原则融入法律体系,以此教化天下。《唐律疏议》中对诚信有着非常具体的法律条款,如官员隐匿或妄报灾情,隐匿祖父母和母丧情不报,将面临“杖七十”“流二千里”或“徒三年”等惩处。在民事方面,对于缺少少两、悔婚骗婚的行为,相关人等也要被处以“杖六十”“徒一年”等刑罚。

在唐太宗“德礼诚信”治国理念的影响下,天下呈现出“路不拾遗,外户不闭,商旅野宿焉”的太平景象,百姓安居乐业,遵纪守法,犯罪者锐减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更是记载了一段以诚信治天下的佳话:贞观六年(632),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有390人,年终之时,唐太宗下令将他们“纵使归家”,让其与家人团聚,命他们于第二年秋天再返回朝堂接受刑罚。第二年秋天,这些囚犯“无人督押,皆如期自诣朝堂,无一亡匿者”。唐太宗被这些信守承诺的囚犯所感动,最终赦免了他们的死罪。

“君为源,臣如流”“以至诚治天下”,这些彰显贞观治世智慧的著名箴言,与唐太宗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核心治国思想一脉相承,更是其以信治世、至诚理政的经典人格写照。

唐太宗的诚信

王厚明

德礼诚信